

## 從陶器到瓷器

早在一萬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就有了原始陶器的生產。考古工作者在江蘇省南京市溧水區回峰山神仙洞，就發現了距今一萬年以上的泥質紅陶片。陶是什麼？陶的本質是泥土。原始社會製造陶器，開始是用手工捏造的方法製成一定器形，後來發展為將陶土搓成一樣的泥條，再把泥條盤成一定器形，將其內外用手抹平。到父系氏族社會階段，出現了輪作制。進入封建社會後，勞動人民又發明了模製法，即將陶泥填入模具中，脫出器物的全形。學術界認為，最原始的燒製方法是堆燒法，把曬乾的陶坯放在露天柴

草中燒。在六七千年前，中華先民已經開始使用燒製陶器。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據陶器的顏色，把陶器分為紅陶、灰陶、彩陶、白陶、彩繪陶、黑陶和釉陶等系列。

陶器當然不是由一個地方發明而傳往世界各地的，它是各地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各自獨立地創造出來的。各國先民之所以都能獨立地創造出陶器，是因為先民掌握了火，幾乎各地都有燒製陶器的泥料，而陶器工藝簡單，燒成溫度低，便於普遍掌握。但當世界各國長期使用陶器時，只有中國的先民發明了瓷器，使得陶瓷製品成為中華文明的象徵之一。

瓷器的製作工藝是在製陶技術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1980年，在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考古工作者發掘出土了一批殘片，屬於距今4000餘年的龍山文化晚期遺物。根據其「胎質堅硬細膩、表面施有薄釉、釉層不均勻、火候較高（燒成溫度達1200℃）」等特點，人們將它們叫作「原始青瓷」。與陶器相比，它們已具有耐高溫、易清潔、堅固耐用、不滲水的特點，在質地、外觀和使用上明顯地優越於陶器，故而一經出現，便博得當時人們的喜愛。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中，從一座貴族墓裏發現了一件形器，其表面就塗有一層薄薄的青綠釉。這也是迄今考古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原始瓷器。之所以加「原始」二字，是因為它在燒成溫度、吸水率等方面與成熟的瓷器相比還有質的差別。在黃河流域、長江中下游流域的商周時期的墓葬中，也均有原始瓷器出土。



2004年，在江蘇省無錫鴻山戰國早期越國貴族墓裏就出土了上千件原始青瓷禮樂器，可以說是一個驚人的發現。

但是，去掉青瓷的「原始」二字並不容易，中華先民在長期製陶過程中，不斷認識原材料的性能，總結燒成技術，積累豐富經驗，經歷長期探索，才在東漢時期（距今1900餘年）終於燒製出成熟的青瓷器與黑瓷，實現了陶轉化為瓷的偉大飛躍。這一時期，隨着煉鐵術的發展，在黃河、長江、珠江等流域出土的青瓷，燒成溫度已達1300℃，燒結良好，不吸水性強，成品相當精緻。北京歷史博物館建館之初發掘河南信陽擂鼓台，曾發現東漢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青瓷盞、壺等器，胎骨堅實，釉色勻淨。這種早期青瓷，是西漢鄒陽《酒賦》中所說的綠瓷。

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中國的瓷器終於達到了「越瓷類玉」的效果。越窯青瓷代表當時青瓷的最高水平。越窯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一個瓷窯，東漢已初具規模，經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初步發展，到唐代，越窯青瓷無論是在產量還是質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發展和提高，當時的文人墨客紛紛吟詩作賦讚美。陸羽《茶經》說：「碗，越州（指浙江紹興）上，鼎州次，婺州次，嶽州次，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由此看出，越窯生產的青釉瓷器具有獨特的色彩，當時受到人們的極大關注，被賦予很高的評價。

唐宋時期，瓷器比較普遍地達到了玉的意境。當時造瓷技術益見提高，如南方秋高氣爽，空氣濕度較小，宜於燒窯。陸龜蒙詩說「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說的就是工人的寶貴經驗。宋朝窯爐也有革新。北宋龍泉的龍式窯依山而建，窯腔龐大，一窯可置墩170多排，每排容1300多件，估計一次可燒20000~25000件。窯中部作弧形，可降低火焰流速，窯溫可全部利用，而成品釉色如一，無老嫩濃淡之異。

元明清以來，中國的製瓷工藝更是巧奪天工，彩釉加強了瓷器的玉質感，在瓷質的細密和光澤的晶瑩等方面，達到了精美絕倫的高度。宋元創造了青花瓷，明瓷即以此為主流。嘉靖十三年（1534年）造青花瓷6160件；廿年（1541年）造37300件；廿三年（1544年）造24400件，又造桌器1340桌（每桌27件）；三十年（1551年）造11730件；三十三年（1554年）造85030件。數量、質量都有提高。明朝初期青花器色澤濃豔，帶有黑色結晶斑點，中期者藍色淡雅，後期者藍色濃翠，各具特色。清承明制，又有所創新。康熙年間，仿製銅胎畫成功燒製了琺瑯彩瓷。雍正時期，琺瑯彩瓷生產達到歷史的極盛階段。後人評雍正琺瑯彩瓷有四絕：「質地之白，白如雪也，一絕也；薄如卵幕，口噓之而欲飛，映日或燈光照之，背面能辨正面之筆畫彩色，二絕也；以極精之顯微鏡窺之，花有露光，鮮豔纖細，蜨有茸毛且莖莖豎起，三絕也；小品而題極精之楷篆，各款細如蠅頭，四絕也。」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也說清朝瓷



器製造分十餘個工種，分工極細。這時成器，胎骨細潔堅致，白度精煉到 77.5% 的高度，釉色純淨瑩澈，彩色絢麗奪目，鑲嵌捏塑精巧。清朝可稱為封建社會瓷器手工業的黃金時期。

## 遙遠的航線

唐代陶瓷業的發展，最初主要是為了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和作為貢品供皇室享用，並沒有開拓國際市場，進行對外貿易的意圖。隨着對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外國使臣、學問僧、留學生和商人紛紛前來中國，唐朝政府也曾多次向外派遣使節回訪，作為禮品帶去了唐三彩和許多精美的瓷器。外國留學生、僧人和商人受到中國人普遍使用瓷器的影響，首先成為中國瓷器的愛好者，回國時帶去大量瓷器，作為禮品贈送朋友和自己日用，因此他們也是中國瓷器向外輸出的傳播者。由於外國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禮品瓷已無法滿足，兼之唐朝瓷器不僅代替了銅器、漆器的使用，節省了鑄錢的原料，而且唐廷發現瓷器與茶又可向西北市易馬匹，以為軍用，對國計民生，兩有裨益，中國瓷器大規模出口的序幕遂由此揭開。當時的阿拉伯作家扎西茲（776—868 年）在他的《商務觀察》一書中，列舉了從中國運去的「多彩陶瓷」；地理學家伊本·法吉赫在其《地理志》中，也將絲綢、瓷器和燈列為中國的三大名產。9 世紀中葉的阿拉伯商人蘇萊曼經過海道來中國經商，並於公元 851 年（唐大

中五年）寫了一部《東遊記》，高度讚揚中國人能用陶土做成品，並說當時的「漢府」（即廣州）有大量的陶瓷器待運。1973 年，泉州後諸港兩米多深處的海泥中發掘出一艘木製遠洋貨船，共有 13 個船艙，艙內裝有各種商貨，其中就有為數較多的宋代銅錢和瓷器。1976 年，朝鮮新安郡海域曾打撈出一艘中國元代沉船，該船大約是在公元 1310 年至 1325 年間從寧波出發經朝鮮駛往日本途中遇難。從船中撈得遺物 1.9 萬件，其中 1.67 萬件是中國的陶瓷，主要是青瓷，占總數的 57%，青白瓷占 28%，此外還有黑褐釉瓷等品種。

中國瓷器廣受世界各國歡迎的理由很多。一方面，亞非許多國家和地區在中國陶瓷器輸入之前「飲食不用器皿」，多以植物葉子作為食器。南宋《諸蕃志》介紹：登流眉國（今馬來半島）「飲食以葵葉為碗，不施匕箸，掬而食之」。蘇吉丹（今印尼爪哇島）「飲食不用器皿，緘樹葉以從事，食已則棄之」。渤泥國（今文萊）「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為器，食畢則棄之」。就連波斯（今伊朗）也只有其國王飲食才「盛以瓷器（這種瓷器也是從中國進口的），掬而啖之」。中國陶瓷器輸入亞非國家和地區以後，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提供了精良、衛生又實用的器皿，並使當地人民日常生活用器有了很大的改善。

另一方面，中國瓷器實在是物美價廉。元朝的馬可·波羅到福建參觀德化瓷器時說：「刺桐城（指泉州）附近有一別城，名稱迪雲州（指德化）。製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購價甚賤。」「作各



種大小磁碟子，品質皆是可想象的那樣最美麗的……由那裏分散到世界的各處。這裏製造很多，價極便宜，一個威尼斯格羅梭幣可以買三個碟子，並且皆是頂好的，比那再好是你所想不到的了。」

當時，中國陶瓷器陸運主要沿以下線路：北路出長安（今陝西西安），經蒙古到葉尼塞河和鄂畢河上游，往西可到額爾齊斯河流域以西；西北路出敦煌，沿絲綢之路一線到達中亞、西亞等地；西南路經蜀地，進入吐蕃，再到尼泊爾和印度；東北路從長安出營州，可抵朝鮮。陶瓷易於損碎，陸運不易，在長期的實踐中，商人們為使瓷器能經得起跋山涉水、路行萬里的顛簸，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們把每件瓷器內部都裝上少量的泥沙和豆麥，按 10 個一組把瓷器疊摺捆紮，放在陽光充足的地方頻頻灑水，一段時間後，豆麥發芽生長，填充了瓷器內的空隙，纏繞膠固為一體。試投之以地，不破損者，即可裝運。雖然這樣可以保證瓷器無虞，但成本也非常高昂：如此包裝瓷器的價格比一般包裝要貴 10 倍。

但是瓷器畢竟比較笨重，又容易打破，單靠騾、馬、駱駝或人力長途運載，不僅數量有限，而且損耗很大，遠遠不如海上交通船載方便、安全。特別是唐宋以來，隨着中國東南沿海一些港口（如廣東的廣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寧波等）的開發和造船業的發展，海外交通十分發達，中國古代許多外銷瓷器就源源不斷地從這些港口，通過海上交通大量輸向國外。稱這條海上交通為「瓷器之路」是毫不為過的。譬如當時以生產外銷瓷器為主的長沙窯，其產品主

要是在銅官鎮碼頭上船，沿着湘江至嶽州，然後過洞庭入長江，抵達揚州，以揚州為主要中轉站。長沙窯瓷器上就有「借問舟輕重，附信到揚州」的詩句。然後再經京杭大運河到杭州，入曹娥江，由曹娥江轉入餘姚江到明州（寧波），跟越窯青瓷器一起向東運往新羅（朝鮮）和日本。或者，長沙窯產品從揚州向南入浙江，和越窯產品一起進入廣州，裝上出海巨舶。瓷器的商路或者從廣州、杭州、寧波等地出發到朝鮮和日本；或者「自泉州、廣州西南行，至占城，沿海岸西行，至真臘、羅斛，南航至吉蘭丹、彭坑、西竺向西航行，渡馬六甲海峽至蘇木都刺的南巫里（印尼蘇門答臘的哥打拉夜，今班達亞齊），自南巫里向北至白古（緬甸的勃固）、孟加拉，沿印度東海岸航行，向南渡海峽至僧伽耶山（斯里蘭卡）；自南巫里西航橫渡東印度洋，抵科倫坡，西航至俱蘭（今印度奎隆），沿印度西北海岸西北行經放拜（今印度孟買），直抵波斯灣的忽里模子（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和波斯羅（伊拉克的巴士拉）」，隨後繞過阿拉伯半島抵達紅海，在埃及中轉後直達羅馬等地中海城市和東非沿岸。

## 世界瓷都

明清時期，中國陶瓷進入了彩瓷時代，達到了精美絕倫的境界，更成了人類共同喜愛的珍寶。由於當時世界聯繫日益密切，明清瓷器具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影響，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入世界



市場，並成為新開闢的世界市場上頗具競爭力的商品。鄭和航海對於中國瓷器的輸出無疑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據鄭和隨從人員費信記載，中國瓷器在外國很受歡迎。另一隨員馬歡談到，爪哇「國人所喜中國青花瓷器」，又談到正德五年（1510年），鄭和船隊到達加爾各答時，曾見到一艘麥加船停在那裏，便派了七名使者去麥加，帶去的是「康香和瓷器」。由此可以肯定，鄭和航海所攜瓷器一定很多。國外有的研究者說：「鄭和遠航使中國瓷器與東非發生直接聯繫，使中國瓷器在海路沿岸國家得到普及，該是毋庸置疑的。」這種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從此以後，印度洋沿岸各國出現了許多中國瓷器的市場，15世紀以後海路終點一帶的東非之角索馬里就曾是一個廣大的中國陶瓷市場和集散地。甚至有人說，公元10世紀以後的坦噶尼喀地下埋藏的歷史，就是用中國瓷器寫成的。

在明清時期的瓷業發展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景德鎮的興起。《浮梁縣志》留下了關於景德鎮最早燒造陶瓷的記載：「新平冶陶，始於漢世。」早在宋代，景德鎮就由於瓷業繁盛，逐漸嶄露頭角。《景德鎮陶錄》卷五載：「景德窯，宋景德年間燒造。土白壤而埴，質薄膩，色滋潤。真宗命進御瓷，器底書‘景德年製’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當時則效，著行海內。於是天下咸稱景德鎮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明清之際，景德鎮已是一個「二十里街半窯戶」，「人口近百萬，窯約三千，晝間白煙掩蓋天空，夜則紅焰燒天」的重要城市，成為舉世聞名的製瓷中心。

發展至明清時期的景德鎮瓷器，以高嶺土和瓷石作胎，以釉石摻入釉灰作釉，在釉下或釉上施以彩繪或不施任何彩飾，入窯燒製而成。舉世聞名的高嶺土在明代嘉靖之前叫作「麻倉土」，是元代的景德鎮陶工在景德鎮附近的麻倉山找到的優質製瓷原料，並以之與瓷石結合，開創性地形成瓷石的「二元配方」。這一創舉提高了景德鎮瓷器的致密度和硬度，使景德鎮製瓷業在原料上比全國其他製瓷區更勝一籌。正因為高嶺土的發現和介入，瓷胎中更容易形成玻璃相，燒成的瓷器質地更加細膩，透明度更高。將外壁纖薄的盤或杯移向有光處，可以看到另一邊的手的影子，這種瓷器最受國外市場的追捧。二元配方提高了瓷器的燒成溫度，使泥料更加適宜成型和加工，成品更不容易變形，為明代景德鎮陶工給西亞、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燒造直徑超過50厘米的大盤及其他大件器物奠定了工藝基礎。「高嶺土」一詞也因此成為高品質瓷土的代名詞而譽滿全球。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記錄，景德鎮瓷器「共計一坯之力，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過手七十二，共有三十六道工序，在明清時期來說，如此分工細緻的流水作業線是非常先進的。17世紀的一個西洋傳教士殷弘緒看到如此場面後在信中寫道：「看到這些器皿如此快速地經過如此多人之手，真是令人驚奇。」事實上，當時的景德鎮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瓷都」，它之所以掌控全球瓷器市場，不僅僅因為產品精良，也因為生產規模與組織先進；它代表了在蒸汽機器年代到來之前，手工藝產業的最高峰，大規模集中生產最壯盛的



成就。殷弘緒筆下的景德鎮夜間景象（「全城猶如一座熊熊燃燒的巨爐」）並不只是幻象錯覺，而是如實反映每日生產運作的真實景象。

從明代中期開始，景德鎮的瓷器幾乎佔據了全國的主要市場，進而佔領海外大部分市場。16世紀後期葡萄牙人非法佔據澳門後，澳門成為中西貿易的中心。中國（景德鎮）瓷器由葡萄牙人少量地帶往歐洲。那時中國瓷器的價格是極為昂貴的，葡萄牙人因此獲取了巨大利潤。據估計，荷蘭、葡萄牙商人最早販運瓷器到歐洲時，瓷器的賣價幾乎與黃金等價。一個瓷盤運到歐洲銷售，利潤至少是成本的10倍。由於中國瓷器的獨一無二，歐洲國家的國王先後以擁有中國瓷器為榮，最先是葡萄牙國王，其次是西班牙國王，之後擴展到各國國王，隨後豪門富商也仿效國王建造收藏中國瓷器的展室。隨着歐洲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歐洲成為世界富裕的中心，中產階級也有能力擁有中國瓷器。17世紀西歐的繪畫中，特別是荷蘭的生活畫上，中國外銷青花瓷盤、碗、果碟、酒杯、酒壺、軍持等經常出現。

據國外有關檔案的統計，從荷蘭東印度公司建立到康熙三十四年（1602—1695年）販運到歐洲的中國瓷器約2000萬件，包括明清時期的青花、五彩及廣彩瓷器；從萬曆三十二年（1604—1656年）銷到荷蘭的瓷器達300萬件，平均每年6萬件；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年銷到荷蘭40萬件中國瓷器。往歐洲銷售瓷器的除荷蘭東印度公司外，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和法國東印度公

司。雍正十二年運到法國的瓷器有68000件，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運到英國的瓷器約40萬件，乾隆十五至四十六年（1750—1781年）的三十二年間運往瑞典的瓷器達110萬件。粗略估計，明末清初這一段時期，景德鎮平均每年輸入歐洲、美洲等世界各地的瓷器不下100萬件，景德鎮可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世界製瓷中心了。

## 歐洲的「China style」

與瓷器生產的興盛狀況形成對照的是，當時中國絲綢製造業要遜色得多。例如，明代的絲綢官手工業這時已呈衰微。宣德五年（1430年），河南布政使魏源上奏：「本司織染局歲造緞匹，皆用所屬府州縣人民稅絲。自永樂二十二年至宣德四年，因民逃徙，逋負稅絲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兩，逐至紵絲五百六十三匹未納。」明英宗繼位之初，曾指斥工部「近年以來，徒見糜費民物，而緞匹多不堪用」。這說明絲織業的不景氣，而這又勢必影響到絲綢的輸出。相反，有材料表明瓷器官手工業則是上升的，因而也就促進了瓷器的輸出。

其實，當時的歐洲人到中國來經商，並不僅僅只是為了購買瓷器，他們之所以特別喜歡載送和購買瓷器，是因為瓷器既重又不透水，是最實用的壓艙貨，可提高船隻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的穩定度。167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駐越南代表回報倫敦總部：「此地以



粗瓷壓艙，極有道理」，全都是運往菲律賓、泰國的現成船貨。瓷器不僅可以壓艙，還可以和其他的貨物混裝，如「各式有用的中國瓷器，特別是盤碟之類，可以裝得很緊密。再買一些大中小各種尺寸的碗、大到可以種橘子樹的中國大花盆、種小樹小花的小盆……你買來的任何中國容器，都把它們裝滿西穀、米、椰子、澱粉或其他利潤更好的貨品」。其實瓷器不僅可以和各種食物混裝，尤其重要的是，其可以跟茶葉混裝。如荷蘭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都用鉛襯的箱櫃運茶以保新鮮，再把茶箱放在裝瓷的條板箱上。瓷器可保茶葉乾燥，茶葉則能夠減震緩衝以降低瓷器的破損率。由於瓷器有如此種種與其他貨物混裝的優點，所以幾乎所有來中國經商的船隻都會購買一些美麗的各色瓷器。

17世紀末18世紀初，是中國貨在歐洲最為風靡的時期，那時在歐洲刮起了一股「中國風」。人們把中國看作是最為時尚的國度，既神祕又令人神往。這時，歐洲人不但着迷於中國產的物品，就連建築也常常模仿中國風格。歐洲許多國家都有這種仿中國建築屹立在花園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皇后島上，就有一片仿中國建築的宮殿群，這個建築群被當地人稱為「中國宮」。因為王后十分喜愛與中國有關的東西，國王為了討得愛妻的歡心，特意為她建造了這片宮殿。許多從中國運來的瓷器、漆器、絲綢等工藝品陳設在這片宮殿裏。瓷器在歐洲被看作是「白色的金子」，人們為能擁有中國瓷器而備感驕傲和自豪。在當時的歐洲，擁有中國瓷器是權貴的象徵。

據說法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曾下令掀起一場日用品革命，將原有銀器用具廢棄，改用中國瓷器，從此使用中國瓷器的風氣更普及到民間。在英語裏，中國與瓷器是同一個單詞(china)，足見在早期西方人眼裏，兩者的聯繫是多麼緊密。

實際上，早在中世紀時期，阿拉伯人就在仿製中國瓷器，但是一直沒有成功。究其原因，他們在兩個關鍵點上沒有掌握燒製瓷器的方法：其一，沒有找到白瓷生產的原料——高嶺土、長石；其二，窯溫沒有達到1200°C。阿拉伯人在中世紀只有豎式窯爐，窯內溫度無法提高到1100°C，而中國瓷窯普遍採用橫式窯爐，窯溫在1200°C以上。由於阿拉伯人當時沒有掌握中國瓷器的製造方法，只能生產陶器。中世紀，歐洲人仍處在模仿阿拉伯人生產陶器的狀態，當然也就無法從阿拉伯人那兒學到瓷器的製造方法了。直到1470年左右(明成化年間)，意大利威尼斯煉金術工人安托尼俄等從阿拉伯人處學習了中國製瓷術，造出青花軟瓷，當時被稱為「阿拉伯的藍色瓷器」，而那時歐洲所需要的瓷器仍依賴中國。直到18世紀初葉，德國人製造出真正的瓷器——硬瓷，之後推廣至法國、瑞典、英國、俄國、西班牙等地，歐洲才算有了自製的瓷器。

儘管如此，這時的景德鎮瓷業仍具有領先的生產技術，深厚的藝術底蘊，資源豐富，生產量巨大。中國瓷器價廉物美，在世界市場上是最受歡迎的商品。西方國家一方面大量進口中國瓷器，一方面出於限制白銀外流的考慮，又宣傳不要購買中國瓷器。當時英國



有一首詩歌是這樣的：「為什麼把錢往海外拋擲，去討好變化無常的商賈？再也不要到中國去買 china，這裏有的是英國瓷器。」然而，英國生產的瓷器在手工業階段無論質量、數量還是價格都無法與景德鎮瓷器競爭，英國消費者仍然願意大量買進中國（景德鎮）瓷器。

直至 18 世紀後期，隨着德國邁森、法國里摩日、荷蘭代爾夫特及英國斯坦福德郡等地諸瓷廠的建立，歐洲的製瓷技術發展迅速。隨着蒸汽機的廣泛運用，陶瓷工業也由原來的手工作業改為機器生產，由原來的與景德鎮不可比，一躍而在數量、價格、花色品種上超過了景德鎮。最終，在 19 世紀初期，歐洲瓷器開始逐漸取代來自中國的傳統產品。在鴉片戰爭前夕的 1834 年，美國的傳教士衛三畏所寫的《廣州的主要進出口商品》中有這樣的記載：「瓷器，這種貨物現在出口很少。當東方產品最初繞過好望角被運往歐洲時，中國瓷器價格很高，船靠它獲得巨額利潤。但它的製造方法已被查明，歐洲國家開始製造並很快與中國瓷器展開競爭。中國瓷器是成套賣出的，一套 270 件的餐具價值 12 至 75 兩，一套 20 件的早餐用具價值 3 兩，一套 101 件的大型茶具價值 11 至 13 兩，49 件的小型茶具價值 5 至 6 兩。中國人還製造各式各樣的花盆、花瓶、罐子、水果籃和餐桌裝飾品等。」通過這段話已經可以看出，在清代道光年間，中國的瓷器已經失去了世界市場，瓷器出口的利潤已經變得十分微薄了。

## 海商？海盜？ 致先驅者

